

稿本《徐乃昌日记》的文献价值

李弘毅

一 积学斋主人卒年考

《南陵县志》云“光绪癸巳[1893]恩科,徐乃昌,字积余,号随庵,覃恩一品,封典赏戴花翎,二品衔官,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监督金陵关。”^①虽然此书是徐乃昌纂修,但也未记载他的出生年。

《续补藏书纪事诗传》记徐乃昌:“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十九岁。出身监生,后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民国后寓居上海。以积学斋名藏室,所藏古槧、清人文集甚富。抗战期间,藏书渐佚至尽。编有藏书志,其稿本《积学斋善本书目》和《金石拓本目录》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另有《积学斋藏书记》四卷、《积学斋书目》一卷、《随庵徐氏藏书志》,均稿、抄本,未刊。藏书印有‘积学斋’、‘南陵徐氏’、‘积学斋镇库’、‘徐乃昌曝书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南陵徐乃昌审定善本’、‘积余秘籍识者宝之’等。”^②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在谈到徐乃昌“生平简历”时也认为他“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监生出身,光绪十九年癸巳恩科举人,江苏候补知府,奉派办理江宁、南通厘务,署淮安知府,丁忧服阙后升候补道,光绪二十六年经外务部侍郎徐寿朋奏保人才,

奉旨交军机处存记。三十年[1904]江南遣送学生留日学习陆军、实业、师范等近百人,总督端方都派徐乃昌率领赴日,并顺道考察学务。光绪三十二年又办理其叔父曾经手的仪征淮盐总栈,因缉私裕官有功,颇受端方的器重,一年后便获端方再度奏保人才,奉旨仍交存记,至宣统三年元月始授官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民国成立后迁居上海,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卒,享年六十九岁”。^③

笔者在整理善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馆藏稿本《徐乃昌日记》全三十二册,是书每册按时代的先后顺序连续编号——庚申年[1920]至戊寅年[1937]五月二十日。无页码,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不定,白口,上鱼尾,红格,从1到25册及28、29册版心下印有“天来生”;26、27、30及31册部分版心下印为“宏大号”;31册部分至32册,多采用无行格的毛边纸,用钢笔和毛笔书写,字数不定。另外,32册下半部分即丁丑年[1936]八月初一到戊寅年[1937]五月二十日,每页采用“涵芬楼”便笺用毛笔书写,后来被粘贴在“宏大号”本上。从馆藏《徐乃昌日记》第32册上徐氏亲笔所记“丁丑年,是年七十岁”的情况来看,徐乃昌应是年过古稀。

又据南陵县文史办撰《江南名士徐乃昌》一文言:“徐乃昌,字积余,晚年号随庵老人,祖籍安徽省南陵县上北乡十都一图汤村徐(今属工山乡山峰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元1868年),卒于民国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六岁。”还说“笔者乃奔波外埠图书馆,查阅有关文献记载,以及寻觅其后裔,提供了一些第一手史料,整理成篇。”^④但可惜的是此文没有提供引证具体材料的来源,且《徐乃昌日记》第三十二册上记载他晚年身体状况极差,并多次住医院。南陵县文史办撰文称徐乃昌“享年七十六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

但是可以肯定,徐乃昌从“1912年定居上海”直到逝世,前后共有20多年的历史。馆藏32册稿本《徐乃昌日记》,记载了徐氏从庚申年[1920]到丁丑年[1937]定居上海以后的一段社会经历。当然在

他定居上海以前是否还有自己记录详细的文献存在,现在还不得而知,据缪荃孙云“余与积余戊子秋间晤于琉璃厂书肆,谈及经籍目录,如瓶泻水,余心佩焉。因以订交三十年,何敢以不文辞夫。”^⑤“戊子”年为光绪十四年(1888),而写此序的时间是“订交三十年”后,即1917年,这时刚好“积余年方五十”。^⑥还据史料记载“徐乃昌尚有数十年从未间断过的日记及部分藏书,因保管不慎,有的转实他人,迄无下落。”^⑦从笔者所见徐乃昌日记中记录的内容来看,凡其有所得必多宣之于篇章,估计在1920年以前应该也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如果能找到这一段历史记录,可以说就有可能全面而系统地概括出徐乃昌一生的功绩。

二 积学斋藏书及其目录

中国历史典籍的传承,有相当大一部分都归功于私人藏书。叶德辉曾将“藏书”事业比作同“积金”、“积阴德”一样崇高的事业。^⑧徐氏积学斋藏书尤以“传播经学、史学、地学、算学无所不备,书又多可传,无偏嗜、无杂糅”;^⑨特别是他“所收国初及乾嘉时之善本尤多,以时近不入目,荃孙得国朝人文集千种,比积余所藏犹小巫也。”^⑩清末民初的藏书家中能为缪荃孙所称赞的并不多,由此可见徐氏积学斋之弘富。

在本文撰写时,参考了华东师大图书馆藏的三种书目,曾蒙该校中文系甘露博士帮助查阅并记录,其中:第一种《积学斋藏善本书目》,是书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划分,收书579种,其中宋本一种,元本六种,明本三十六种,日本刻本一种,未提供其他的记录信息;第二种《徐乃昌藏词目录》,共划分为八部分,收词集和单刻本801种,词目未记录版本信息;第三种《积学斋书目》,共收书42种。据说以上三种书目均为稿本。

另据记载,南开大学图书馆也藏有《积学斋书目》,但不知是否与华东师大图书馆藏书目录同出一源。笔者还从国家图书馆网页

上检索到,该馆藏有抄本《积学斋藏书记》四卷,到底此书为何人所抄?抄自何本?是否包含了华东师大图书馆藏三种书目的信息或更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考证。但是积学斋藏书确有相当多的部分已经遗失,据伦明言“今所藏已尽散,其佳者多归天津李嗣香。”^⑩

还据南陵县文史办记载:“《积学斋善本书目录》以及金石碑帖本六千种,存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内,还有不少木刻版本存放在苏州报国寺内。抗日战争以前,曾赠送梓乡(安徽南陵)民众教育馆线装书数千卷,并用木板夹住,纱带扎紧,一部一部置于书皮内,藏于孔庙明伦堂真经阁上(当时为县参议会址),县长刘植派林达章继任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倭机轰炸县城,为保护好文物,林馆长派人将几大橱珍贵文献搬至香由寺。不久,继任县长刘靖清见香由寺古木参天,林荫密布,为防空袭之好场所,命县府备科室迁香由寺办公。林达章无可奈何,只得另迁南门城外茶庵。时进隆冬,天气酷冷,县府卫兵将一捆一捆古书援出燃烧御寒,就这样,珍贵文献全部烧光。”^⑪说明徐氏积学斋藏书在抗战时期就逐渐地在开始流失了。

然而所幸的是在本馆馆藏中,不仅发现了一部很有研究价值的《徐乃昌日记》,而且还发现了徐氏流失的一些重要藏书,如:稿本《玉台新咏札记》一卷;又有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唐陆龟蒙撰,清雍正九年江都陆钟辉水云渔屋覆刻元陆德原本,并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印。其中有的已被记录在《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中,有的还未作过记录。^⑫在这里仅就《徐乃昌日记》而言,笔者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不少记录积学斋藏书的材料,概而述之如下:

(一)释、道书籍的收藏

[庚申年(1920)]元月十九日,向仲祐购梵夹本释藏五种,道藏一种(此种退回):(释)《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唐三藏法

师义净奉制译,明嘉靖三十六年正月上元日重刊)(十卷,末有明僧手书题名:奉佛比丘信僧承慧,诚心募化十方檀越缁素僧俗人等,各施贿资印造金光明经,祈保施财人等,春安夏泰秋吉冬享,隆庆六年四月吉日);(释)《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前有元后至元杭城妙觉智松柏庭校正重刊序,每卷有“昭庆寺仙桥东首大字经房慧空印造”一行);(释)《华严宝忏法》三卷(属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释)《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特进试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赠司空,谥大辩正,广智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法师奉诏译,每卷末有僧录司左善事兼管大护国慈寿寺住持本在印。卷下末有二行:大明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大明万历十六年正月初一日造);(释)《销释金刚科仪》一卷(末有题名四行:天启三年四月吉日;御马监太监郝进发心印造《太金刚科仪》十部,十方讽诵以此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普颌众生,同游华藏);(道)《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三卷(此种退回)。

[癸亥年(1923)]十一月初八,购梵夹本(崇祯二年苏北禅寺大昱募刻)《华严经》(实叉难陀译本,计八十二卷),附(内有万历刻本)《普贤行愿品》(般若译)复庵和尚纶贯,共八十二册(疑阙《懺佯品会》两册)。价洋四十元。

[癸酉年(1933)]九月二十一日,至藏经会晤费范九,交恽季申预约《藏经》价七十二元五角,又书套二十元。……藏经会送来预约凭单即函恽季申。以旧藏宋绍兴二年湖州圆觉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三十二(经文并题名四十页,共半叶)绍兴戊辰湖州开元寺《陀罗尼杂集》卷第五(经文并题名三十三页)函送藏经会费范九影印。

“藏经会”即“影印宋版藏经会”,由朱庆澜、徐乃昌、费范九、范成师等人组成,1932年在上海成立,并筹备款项对当时还传世的宋版藏经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是近代最大的一次宋版藏经整理活

动。在《徐乃昌日记》中曾多次提到参与“藏经会”或“影印宋版藏经会”的有关活动。照《徐乃昌日记》记载,到甲戌年[1934]元月29日四时止,他们已开了49次理事会;并且徐乃昌还把自己收藏的宋版藏经送藏经会影印。

(二)明清刻本的收藏

缪荃孙云:“南陵徐积余观察,德行纯竺,问学淹雅,收藏富有,冠冕皖南。”^⑭其图书收藏在皖南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徐乃昌日记》的记载来看,特点如下:

[庚申年(1920)]三月初九购王锡生各书共价三十九元:《古文苑》二十一卷(有注,元刻明补本,每页十行,行十八字,二十八元),《东武诗存》十卷(王赓言嘉庆二十五年刻本)(以下四种共五元),《即墨诗乘》十二卷(周锡璜道光二十年刻本)、《遵化诗存》十卷(丰润孙赞元编辑,遵化史恩培参订,光绪丁亥刻本)、《鸳水联吟集》二十卷(嘉兴岳鸿庆集订,道光戊戌刻本)。^⑮

[庚申年(1920)]六月十八日至忠厚书庄购严铁桥为继莲龢(昌)校《抱朴子内外篇》,价五元(此书严校本为最佳,去年购陈立炎一本,价二十四元)。^⑯

[辛未年(1931)]至中国书店托代售《安徽丛书》预约券,并取(十二月二十一日付):《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三卷(李岷慈纂修,洋十六元。明天启四年刻本,序题濂溪周元公志,中缝上题濂溪志,中缝下有刻工人名,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双边);^⑰《如兰集》二十卷(董紫选辑,乾隆庚辰刻本,洋六元)。^⑱

当然《徐乃昌日记》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材料,这里笔者仅摘录了一部分。从上面的记载看,徐氏一生收藏了不少明清善本,且在收藏时都进行了仔细的挑选,有的还记录下行款格式并加以考证,说明他不愧为一代版本学家,所以缪荃孙说“闻君多藏善本”。^⑲

但是笔者同华东师大图书馆所藏书目相对照,《徐乃昌日记》中所载书有些不见于其书目之中,如:元刻明补本《古文苑》二十一卷、明天启四年刻本《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三卷、严校本《抱朴子内外篇》等,这都说明那些藏书目(藏书记)在当时还没有定型,所以目前所见到的书目都是以稿本或钞本形式出现。

(三)书籍买卖情况

“徐乃昌自幼颖异聪慧,博学广闻,才华横溢,好学汲古,勤考经文。十余岁时,曾从苏州名书法家姚孟起(凤生)先生学书。年弱冠,即离家自立。光绪十九年(1893)以优员至南京中乡试,为举人,援例候补知府,分发江苏。光绪二十七年署淮安知府。”^②可见徐乃昌在幼年时就接触了不少的古籍,他同缪荃孙晤于光绪十四年(1888)北京琉璃厂书肆并定交。此时他已开始了书籍收藏买卖的活动。目前以《徐乃昌日记》所反映的情况看,他买书的途径除琉璃厂书肆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古籍流通处、中国书店,也有从私人收藏家手中购买或卖出的,可见如下列记载:

[庚申年(1920)]二月六,初四日向丁仲祐同年购徐固卿书三种,计价二十四元九角。

[庚申年(1920)]三月初五日为逸塘购商务印书馆《大清会典》三部,每部减收一百元。今缪衡已将款送来,并约午后二时购涵芬楼善本书,至期前往,即将《会典》价三百元交拔可。三时逸塘、缪衡、雨麓同至,振唐亦先来。六时散,晚拔可送来发票三份。涵芬楼有《众香词》钞本,段归补钞乐集、御集、数集,以成完书(旧钞缪艺风刻本只礼、射、书三集)。此词访求二十余年不可得。前年在杭州书肆书目,此询之已售诸海上,不能记忆某处矣。回申即函询乙庵、^③艺风、菊生、翰怡、石铭,均云未见,今忽得此,喜不自胜(菊生云此本得自京师。赵叔雍云杭州一本为其所购)。

[癸亥年(1923)]二月初三,又至大酉山房观书,每善本索

价甚昂,主人林昌清亦狡狴(宁波旧书,向以大酉为最多,今未见也)。

[乙丑年(1925)]元月二十四日繆子受来函,藏碑由沅妹介绍北京大学购成一万二千元,必须索回《艺风堂续目》方将价付清,并附付沅妹。……至中国书店,取书一种(价七元二角,五月初七日付讫):《折狱龟鉴》八卷,道光二十二年杭州许琰刻本。

[辛未年(1931)]十一月十二日,蒋孟蘋书散出,^②为杨寿祺、孙仲渊所得,今往观取。……十七日杨寿祺约观蒋氏书,取(十二月五日付洋四十元)。

[癸酉年(1933)]八月一日金松岭赠天放楼《续文言》(白竹纸)各五册,当一白纸一册赠谢光甫(十二日又以《天放楼诗续》白纸一册赠光甫)、杨寿祺。六月二十一日,访叶遐庵,未晤,留柳翼谋为江苏省立图书馆购宋藏经,^②商减价函。

(四)注意收藏与地方史有关的文献

[庚申年(1920)]二月六,初四日向丁仲祐同年购徐固卿书三种,计价二十四元九角:《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东吴俞安期汇纂,宣城梅鼎祚增订,侯官曹学佺订校,万历己酉刻本,有明善堂印);《唐诗纪》一百七十卷(初唐六十卷,盛唐一百一十卷,滁阳方一元编,万历乙酉刻本,继《历代诗纪》而作,中晚续刻);《宗门玄鉴图》(前有玄鉴五宗引万里丁未少室参觉虚一识)。仲祐同年贻我《国朝诗萃初集》十卷,二集十三卷,为怀宁潘瑛(兰如)、华亭高岑(映苔)同辑。初集怀宁潘瑛(兰如)、青阳陈塾(熟之)同辑,二集系归愚宗伯诗别裁二作,嘉庆甲子刻本,所收安徽人诗甚多,现编《安徽诗征》大有裨益也。

[庚申年(1920)]五月初十日,段蟬隐庐欧阳厚均《岳麓诗钞》辑得安徽诗人王仕云(歙县)、汪晋征(休宁)、江虬(繁昌)、朱前诒(无为)四家。

[辛未年(1931)]二月十六日至中国书店配《安徽通志》一百二十九卷至一百三十卷刻本,一百三十六卷至一百三十八卷旧钞本。

[癸酉年(1933)]二月三日阅《汪穰卿笔记》八卷毕,其卷七《雅言录》尚可取,亦有传闻失实者。……昨日刘公鲁来谈,交还校正其尊人撰《贵池金石记》稿本二册,又代编《补遗》一册,又还《陵阳献征录》钞本一册。

[癸酉年(1933)]八月二十三日,访黄宾虹,谈并商选所藏印录入《安徽金石志》,又以狄平子画随庵读碑图卷请篆目。

所以胡朴安说,徐乃昌“言及于乡邦文献必穷原竟委,令闻之者悠然发古之情,先生于乡邦文献别具深情也。”^{②4}这些“乡邦文献”在徐乃昌编辑《安徽丛书》、《南陵县志》、《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等一系列书籍时起到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五)注重金石文物的收藏

近代以来,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大量发掘,开拓了人们的学术研究领域。徐乃昌除藏书以外,还收集了一些甲骨文、青铜器和古钱、拓片等,曾被王国维称为“今日藏家之最”,^{②5}并曰“庚申秋日,积余先生复出所藏甲骨拓本见示,其中小半参事已选印入《殷虚书契后编》。然其中文字异体,及卜辞之可资考证而为参事所遗者,亦尚有之,此研究古文字及制度者所不可不肄业及之也,且甲骨一经摹拓,更有损坏,先生此拓其与实物同宝之。”^{②6}据《徐乃昌日记》记载,其收藏有:

[庚申年(1920)]六月五日,顾鼎梅寄沁阳各碑,价八元,又履糲托龙门全份一千九百三十七种,价二十元,邮费四角。

[庚申年(1920)]六月二十三日,函索周梦坡金文拓本,得复书贻金文三十种。

[庚申年(1920)]六月二十四日,唐镜背有铭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二十个字作四

环文,相传柳如是镜。……按,张君房《丽情集》载:蜀后主衍幸凤州,天雄军节度使王承休妻严氏有绝色,衍岌幸之,赐以状镜,其铭云云。

[庚申年(1920)]六月二十五日狄楚青派王秀仁来交还前段六朝各志三十种,《匋斋积金续录》,续借六朝志四十种。

[庚申年(1920)]六月二十八日周梦坡贻延熹三年、泰和五年镜铭拓本。

[癸亥年(1923)]初七,复王静庵书(静庵上月二十四日书来:十三抵津,十六入都,二十日谢恩到差)。洛阳出魏石经甚多,除三大块尚有小块无数,又出一字石经,一小块《论语》,尚有相似者数小块,亦汉石经。此近来一最快意事也。

三 出版事业之继承与开发

徐乃昌“究心训诂,刻意自立,其所刻丛书都二十种,大半乾嘉道咸四朝,鸿生巨儒之所著未尽刊布者,最后附其自著。徐君游京师久,习熟于当代学人之论说,宜其好尚不侔而轨于同,虽然,充徐君之才,则宁惟追随马、鲍诸人之所为,以自表见而已,固将求其大且远者。”^②徐乃昌作为近代以来有较大影响的出版家之一,当然在实施出版时首先注意了对传统工艺的继承。在其出版的过程中,对书籍校勘的要求特别高,据徐乃昌《跋》刊刻南宋明州本《徐文公集》所言:“《徐文公集》传钞本皆从南宋明州本出。光绪间,桐城萧敬孚先生假余家藏明钞本,俾黟县李氏刊之,朱仲武先生任校事,王兰生先生复别为札记,余亦为之正讹补脱。今得宋本,欣为重刊,而诸先生先后归道山,无自析疑考信,犹忆当时雠校,奋笔蹈隙,遇有讹脱,任意增改,迹近专辄。及今复校,有与宋本合者;亦有宋本讹脱而增改为近是者;因宋本而知钞本讹脱;又因雠校宋本而知宋本之不能无讹脱;管窥所及,别为校记一卷。复从《宋文监》、《会稽掇英集》、《全唐文》等书辑得佚文六篇,并附刻焉。”^③这说明徐乃

昌刻书，第一是在求善本，有误也是“不校之误”；^{②9}第二是根据善本把后来刊刻中误于校讎的地方，恢复到南宋明州本“不校之误”的情况，其后再根据这“不校之误”，与从《宋文监》《会稽掇英集》《全唐文》等书辑得的“佚文”进行校勘研究，这正表现了他“究心训诂，刻意自立”的精神；其次是对刻工的要求极高，多聘名家高手为其刊刻。湖北黄冈的陶子麟就是当时著名刊刻家，其刻书风格多以摹刻仿宋及软体字而闻名于世。据《徐乃昌日记》记载：“[庚申年(1920)]三月二十八日陶子麟将《徐文公集》刻样修补工竣，样本寄来。”魏隐儒《中国印刷史》记载“为徐乃昌刻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徐文公文集》和《随庵丛书》，以及为张钧衡刻《择是居丛书》，都由陶氏刻印。刘承幹刻的宋本前四史，虽不见刻工题名，就其雕版技艺来看，也似出于陶氏之手。陶氏一生刻书很多，其中以刘世珩的宋小字本《五代史记》和徐乃昌的《玉台新咏》为代表作。”^{③0}徐氏也因有陶氏复刻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徐文公集》等书为荣耀，并以此来赠与朋友：“[辛未年(1931)]七月二十七日访陈柱尊未晤，留赠《玉台新咏》(棉连纸印)。”^{③1}(癸酉年[1933])五月初六，访胡朴庵，谭赠殷虚兽骨文字印本十纸。复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驻沪办事处(送《随庵丛书》正续编、《徐文公集》二种，均赛连纸印本)。^{③2}另外他还向其他人推荐了陶子麟：[庚申年(1920)]四月二十三日复张菊生书，菊生拟刻家谱属荐良工，以陶子麟告之，并还前段书三种，又贻《翁文恭集》、《群雅集》四十卷(丹徒王豫选)、《怀旧集》(长洲吴翌凤辑，《前集》十二卷、《续集》六卷、又《续集》二卷、《女士诗录》一卷。)、《印须集》(长洲吴翌凤辑，《前集》八卷、《续集》六卷、又《续集》六卷、《女士诗录》一卷。)^{③3}

“贾而好儒”是明清以来人们对徽州商文化下的一大定义，用此来衡量徐乃昌，则就是一位典型的儒商。作为一名接受了西方现代化教育的出版商，对其实业的发展不仅仅是靠传统的管理方式来维持，而更多的是融入了现代西方资本积累的一些方式和手段，

如股票交易、与外商合资办厂,以及企业保险的购买等一系列能保证企业获得丰厚效益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经济。如:

1.[癸酉年(1933)]三月初六日,至大生代繆子受交换三厂九十两新股票,约期一月,掉当收四厘,息三两六钱,又收回上年一厂挂失一百两票面,新票一百五十两票折全套。复繆子受书,一厂挂失股票已担保换新票,折三厂九十两,代换股票三厂两次,息共二十三两六钱。今邮汇三十七元,附抄往来帐单。……收大生三厂三十元二十三两六钱,汇合洋三十三元零四分,代付大使一厂一百两股票,挂先报费十元,除付,净存三十七元零四分。

2.[癸酉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海水泥公司四时六十七次董事会。二十年(九月十日)由公司向日本小野田公司瓜技师北村喜太郎及幼理原田满松土谷利助到公司视察,后因抗日会秩问,于十月七日由公司命其离厂,上次股东会详。取消前约并减给二十一年酬劳金,六十六次董事会详。交王焕功律师(往南市唐家弄五号)考虑,经王律师审查,势难毁约,以李哲士所拟办法似可采用,王亦出席,经会详决酬劳全照附(约四万元),请哲士往日商契约缓行,俟继续订约修改减酬劳金。

3.[癸酉年]十二月十一日费范九来交阅鸿宝斋承印藏经合同,韦寿承领装订合同两稿,又怡大纸样,商范九送仲祐、平子两公定详。沈彬翰来言,保险费须九折,残捐经纸须会收回,庶易解决赔款。十二月二十日,费范九来谭(谈),永宁保险公司每五千保费二元六角。

另外,他还在逐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上倾注了不少心血,首先是从财务制度入手来加强内部管理。“[癸酉年]十一月初二,安徽大学会计组金祖润由中国银行汇来安徽教育经费管理处代售《安徽丛书》洋一千元。”“[辛未年(1931)]一月三十日江彤侯、程林霖均七时半酒叙,《安徽丛书》编印处委员会成立。彤侯(主任)、林霖

(经济)、演生(交际)、镜天(文牍)、宾虹、暨余(编审)为常务委员,汪孟邹(会计)。以林霖捐助一万元存通和银行,所有收款簿、支票簿悉交孟邹保管,新刻《安徽丛书》编印处图章由余保管,凡款须经委员会详决。孟邹写支票再送余盖章,当场详决。暂支开办费二百元。”^④其次,注意控制项目实施的规模,使资金得到合理的利用,“[辛辛末年]二月十五日,昨任心白来书,述及王饶生对于编印《安徽丛书》意见。谓皖省理学、文学均较各省为盛,就婺源、桐城两邑言之,朱紫阳、戴东原、江慎修、方姚诸公刊见之书卷帙已不胜其烦,若以全省鸿著钜细无遗,卷帙多恐驾《永乐》、《四库》而上之未免不经济。深原乡前先辈创此伟大事业,嘉惠于东南文献者至钜,早日观成,以慰□望;尤冀于闾幽扶微多加注意,庶使□瑾握瑜,湮没不彰者,悉得一一表扬,功德宏伟不在大禹下矣。”^⑤由上面的记录可以看出,从图书编纂审定人员的组成、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到财务制度的监督管理等,都形成了严格的程序。当然这种管理机制的形成同他接受西方的管理方式是分不开的。

综前所述,《徐乃昌日记》,是继《积学斋藏善本书目》、《徐乃昌藏词目录》、《积学斋书目》及《积学斋藏书记》以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对于今后善本书的鉴定、古籍整理与研究、以及了解清末至民国出版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

①清余谊密主编,徐乃昌纂修,《南陵县志》卷十九《选举志》,民国间刊本。

②⑪谭卓垣等《清代藏书楼发展史附续补藏书纪事诗传》354—35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③《近代藏书三十家·徐乃昌积学斋》77—80页,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83年版。

④⑦⑫⑳《南陵县文史资料》第七辑《江南名士徐乃昌》,22—29页。

⑤⑥⑩⑭《艺风堂文漫存》卷二《乙丁稿·积学斋藏书志序》20至21页,见缪荃孙《艺风堂文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⑧参见《书林清话》卷一《总论刻书之益》,清宣统三年石印本。

⑨⑩《积学斋丛书序》,见江阴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五册,945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⑬胡昭曦、陈力编《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目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编此书目时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标准,只将乾隆以前的善本书作了记录,而乾隆以后的未录入。但是也存在记录遗漏,如: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唐陆龟蒙撰,清雍正九年江都陆钟辉水云渔屋覆刻元陆德原本,其中就漏载了书中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印记。

⑮⑯⑰⑱⑲⑳《徐乃昌日记》,西南师大图书馆藏稿本。

⑳周敦颐,字濂溪,宋代著名理学家。

㉑孙殿起言“《如兰集》二十卷,縣上董紫,乾隆庚辰精刊。”见《贩书偶记》卷19,5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㉒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年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历任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兼藏书家。

㉓柳诒徵(1880或1879—1956或1961)字翼谋,江苏镇江人。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

㉔蒋汝藻(1877—1954)浙江乌程(吴兴)人(一作诸暨人)。字元采、孟蘋、孟平、孟频,号乐庵,有密韵楼藏书。王国维尝为编《密韵楼藏书志》。汝藻为光绪廿九年举人,官学部总务司郎中,曾参加辛亥革命,任浙江军政府盐政局长。后任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等职。蒋氏为世家藏书,有传书堂、求是斋,被称为吴兴四大藏书家之一。蒋氏密韵楼藏书后来大部分归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其中有些批校本解放后归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㉕《南陵先哲遗书》胡朴安序,丁卯[1927]年版。

㉖《致徐乃昌》(1918年11月30日),载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279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㉗《观堂别集》卷四《随庵所藏甲骨文子序》,见《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㉘徐氏刻《郇斋丛书·张謇序》清光绪二十七年。

②⑧南陵徐乃昌影印宋明州刻本《徐文公集》，民国间刊本。

②⑨《顾千里的校勘学》，载《冷庐文藪》103—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⑩《中国印刷史·民国时期的雕版印书》，420—423页。

③⑪胡朴庵(1879，一作1878—1947)安徽泾县人。原名有忭，韞玉(蕴玉)，字仲明，号朴庵，同盟会员。曾任《国粹学报》编辑，交通部秘书、福建省图书馆馆长暨南大学教授、上海通志馆馆长。其著作有《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等。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接第218页) 举措酷似，别后令作之以为笑。”诗云：“楚相未亡谈笑是，中郎不见典刑存。”使事切矣。谨厚者顾疑焉。朱文公在讲筵，优人王喜时于上前效其行止，进退以为戏。用事者欲赏以閤祗候。上将从之，侍郎诵言将入谏，命乃寝。是不可不禁遏也，矧假为燕笑之乐乎！（宋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卷二）

（七月二十四日）

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乃称万岁，犯者以不应为事重法科。（《金史·章宗本纪》）

（七月二十四日）

作者工作单位:大连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